

第十章

因應高齡社會之 人口與家庭政策研究

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臺灣社會目前的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是否結婚、何時結婚都與生育結果息息相關，本文透過人口與婚育統計資料檢視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研究結果顯示不僅社會經濟發展情勢會影響婚育時間的選擇，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也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決策。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不但影響高齡社會的人力與照護資源提供的可能性，也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照護與代間支持等功能。由於臺灣各個出生世代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多樣的支持與互動關係，產官學各界宜提早規劃相關政策以顧及個人與家庭的福祉，藉以滿足個人與家庭對於社會安全保障的多元需求。

陳玉華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蕭玉資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研究助理
嚴善英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研究生

壹、前言

「少子化」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更是社會、經濟並擴及政治層面的複雜問題。戰後臺灣社會快速完成生育轉型，有效紓解人口壓力對於經濟成長、國家發展的負面影響，但是當多數民眾考量內外條件而傾向晚婚、晚育、少子的行為，整體社會就必須承擔人口急速老化的衝擊。若無法有效提昇生育率、生命期望又穩定增加的情況下，臺灣極可能在數年後成為東亞超高齡社會的一員。2016年臺灣人口性別年齡結構顯示，女性人口稍多於男性人口，經濟活動人口仍占四分之三，幼年人口則明顯縮減。若據此一人口結構推算，預計2060年的人口結構將出現女性明顯多於男性、經濟活動人口縮減、高齡人口比重遽增的趨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由於人口老化速度比其他先進國家快，而且傳統的家庭代間支持與養老功能逐漸弱化，政府部門更應審慎規劃高齡福祉與健康照護政策，尤其是針對照護人力的供給與來源提出因應策略。

不論是「鼓勵婚育」或「引入移民」都是增加人力的可行方式，但是臺灣對於近年超低生育率實際上束手無策。參照歐陸、北美等國實施之婚育或家庭政策，甚至更廣泛的移民政策，不但顯示臺灣現有政策推動的起始點過晚、資源不足，而且明顯存在區域差異，導致家庭政策的整體成效有限，長此以往可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難以掙脫，也難以因應高齡社會的人力需求。本文先透過人口與婚育統計資料檢視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並藉由人力資源運用調查的附帶婚育調查資料呈現家庭內部家務性別分工的現況，藉由兩者說明制訂合宜人口與家庭政策以因應高齡社會的迫切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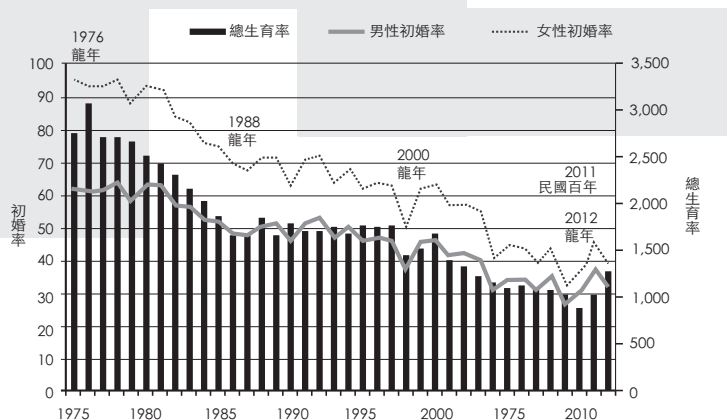
貳、生育與婚姻轉型趨勢

自2008年起，雖然中央與地方政府陸續推出各類鼓勵婚育措施，但是政策與資源缺乏垂直整合，不同縣市或鄉鎮地區提供不同質與量的誘因與政策，對於臺灣整體生育水準的穩定回升並無實質助益(Chen, 2012)。以歐洲為主的生育率研究發現多數經歷過低生育率困境的國家目前都出現生育率上升的現象，這些研究認為時期效應(tempo effect)造成個人延遲結婚、生育時間的影響力已漸趨穩定，其他因素諸如社經發展程度的提升、人均所得的增加、性別關係的改善都對於生育率反轉上升具有關鍵影響(Goldstein, Sobotka, & Jasilioniene, 2009; Myrskylä, Goldstein, & Cheng, 2013)，積極鼓吹並將友善家庭措施落實於勞動市場的人口政策，正逐步改變社會文化規範進而影響個人生育意願(Gauthier, 1996; McDonald, 2008; Klüsener, Neels, & Kreyenfeld, 2013)。相反地，若是將傳統性別分工模式固著於婚育政策當中，男性持續扮演家庭經濟支持的主要角色，與家庭有關的角色與女性仍然密切連結，這類型的人口政策通常無法有效提升整體生育率(Esping-Andersen, 1999, 2009)，若再加上相對傳統的家庭形式與規範（例如：南歐國家，Dalla Zuanna & Giuseppe, 2004）或是偏好小家庭或無子女的家庭生活形態（例如：德語系國家，Goldstein, Lutz, & Testa, 2003），生育率的增加幅度則相對不明顯。

日本、韓國與臺灣在近幾年也觀察到總生育率上升的趨勢，尤其是日本的生育率自2005年即開始反轉回升。不過，日本的人口學者指出其生育數據的反彈可能是短暫的現象，或許僅是反應日本社會在2000~2005年間過度低落的婚育趨勢所導致的個人回補行動(catching up)，再加上媒體對於鼓吹生育子女、組成家庭推波助瀾的效果，確實引發部分遲婚、晚育者考慮結婚並組成家庭。根據近年的生育數據以及其他社經指標完成的推估結果，日本政府的研究仍然預測數年後總生育率會再次下降(Iwasawa

& Kaneko, 2010; Kaneko, 2010)。至於韓國與臺灣的總生育率都是在度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才逐漸上升，而臺灣社會對於民國百年、龍年的喜慶文化偏好更是一舉推升結婚率、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圖1的資料顯示1975至2012年間臺灣總生育率以及兩性結婚率的變動趨勢，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仍然左右許多臺灣民眾的婚育決策，政治與經濟風暴主要影響結婚時間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似乎沒有降低臺灣當年的結婚率，兩性的結婚數據都小幅回升，為什麼？透過表1呈現之2007至2014年每月結婚對數的分布資料，可看出相當有趣的結婚現象。2008年上半年出現的第二次政黨輪替先帶給打算結婚的人新希望，加上2009年為不宜嫁娶的孤鸞年，許多新人趕在年底成婚，10月份開始結婚對數即明顯增加。這些對於結婚時機看似非理性的偏好與預期，事實上隱含相當程度的理性抉擇與計算，卻也是造成2009年結婚率驟降，以及2010年出現全球最低生育水準的緣由。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民國百年的結婚潮，為了隔年能生育龍子、龍女，年底的結婚對數也明顯增加。

觀測臺灣生育率與結婚率的長期變動趨勢，可發現不僅政治與經濟風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圖 1. 1975-2012 年總生育率與兩性初婚率變動趨勢

表 1. 臺閩地區 2007-2014 年每月結婚對數與年度總結婚數

月份	年 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月	15,256	17,979	15,166	14,345	18,015	14,442	17,258	16,455
2月	10,986	12,249	9,137	9,034	8,934	9,855	7,774	9,616
3月	10,932	10,232	11,634	11,425	11,977	15,151	13,562	13,000
4月	11,288	10,056	8,597	12,217	9,780	10,110	10,335	9,707
5月	14,358	16,189	9,132	12,501	14,697	10,630	16,023	18,308
6月	11,219	12,417	8,255	9,224	13,387	10,543	8,776	12,345
7月	11,136	9,270	6,771	9,177	11,022	12,306	11,263	9,975
8月	7,391	3,999	6,614	5,447	5,179	8,045	5,815	5,819
9月	6,059	9,899	6,338	15,843	13,075	7,924	12,758	13,837
10月	12,302	14,198	11,321	12,807	22,064	13,797	13,222	12,828
11月	11,713	16,330	10,188	10,320	18,286	15,280	15,378	10,580
12月	12,401	22,048	13,946	16,479	18,911	15,301	15,472	16,817
總數	135,041	154,866	117,099	138,819	165,327	143,384	147,636	149,28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暴會影響婚育時間的選擇，趨吉避凶的社會傳統文化仍然左右臺灣民眾的決策。這些對於婚育時機看似非理性的偏好與預期，事實上隱含相當程度的理性抉擇與計算。時期總生育率(TFR)易受特定事件、年份的影響而起伏，不易據此推論特定出生世代的完成生育結果。因此，本文利用人口統計資料(戶政司，2016)，針對1950至1995年出生的女性估計世代累積生育率，圖2即顯示臺灣婦女的生育總量確實隨著世代演替而穩定遞減，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則在於不同世代在生育步調的差異。1980年之後的年輕世代雖然晚生育，卻似乎有「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現象；對於1970至1980年間出生的女性，其生育步調不但起步晚、完成生育數量也拖延較

長的時間。根據上述資料推估戰後女性出生世代的最終完成生育率，加上相關制度調整、政策陸續上路，或許最低的生育結果可能出現在1970至1980年間出生的女性世代。

是否結婚、結婚時間早晚與生育結果息息相關。近年來很多討論將晚婚、婚姻盛行率下降的現象歸因於高教擴張。然而，取得高等教育學位對於兩性結婚機會的影響顯然大不相同，研究結果（圖3）顯示具有大學或更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更可能晚婚、不婚，而且隨著年輕世代的教育程度提升，高教育程度女性結婚率的下降趨勢更加明顯。但是，高等學歷對於同齡男性婚姻的影響卻僅顯示造成晚婚的效應，多數擁有大學或以上教育程度的未婚男性自中壯年起即陸續結婚。不過，圖3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部分在於中低教育程度男性的結婚時機與機會。由於女性教育與工作機會與能力的提升，較低教育程度男性的社經弱勢可能造成不易覓得合適伴侶結婚的困境，過去雖有跨國婚姻可作為替代選擇，但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縮短與臺灣的經濟差距，這類型婚姻的數量也有減少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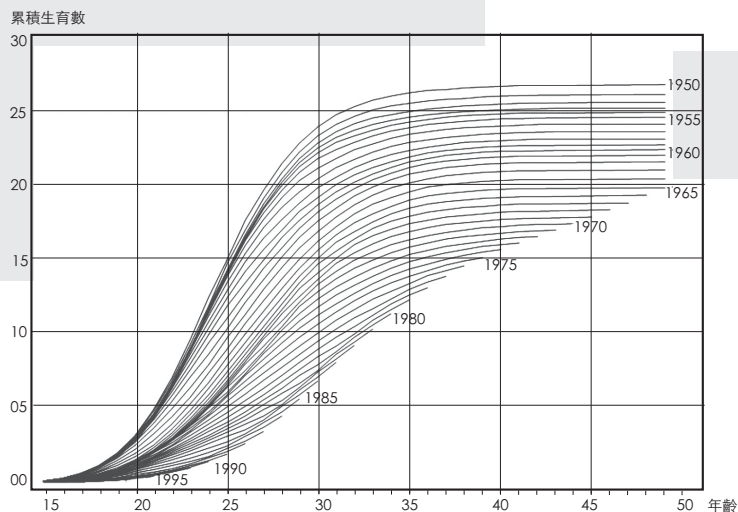


圖 2. 1950-1995 年出生年次育齡婦女年齡別累積生育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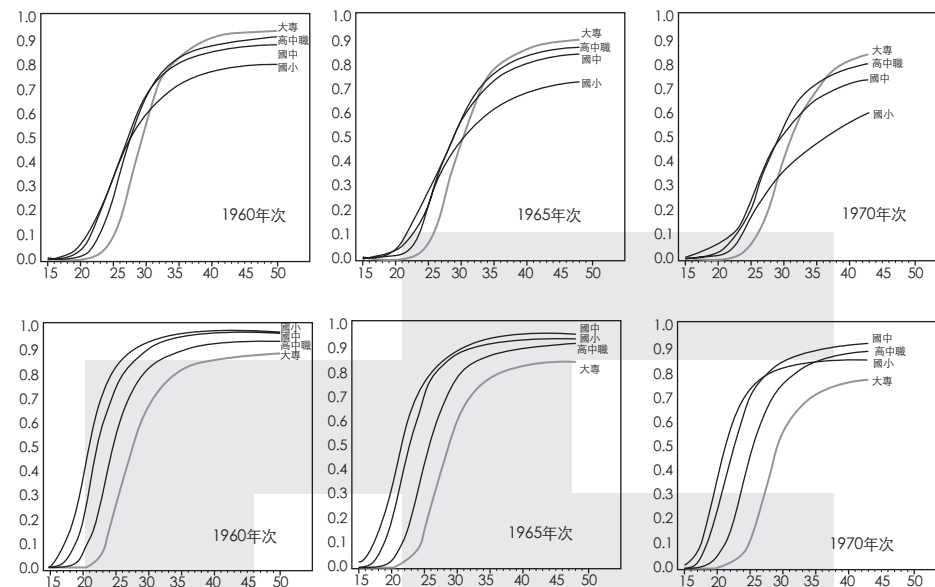


圖 3. 1960、1965、1970 年出生世代年齡別累積結婚率按教育程度分
(上半部：男性資料；下半部：女性資料)

此外，育兒與子女教育成本高漲也被視為抑制國人結婚、生育的主因。近期透過國民移轉帳方法(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ing, NTA)進行的跨國研究，即證實重視教育、強調人力資本投資與競爭的東亞國家確實與歐美國家在資源配置上有不同的世代移轉模式，尤其是利用大量家庭資源投入子女教育更是東亞社會的特色，包括日本、南韓、臺灣三國的父母對於子女的教養投資占其終生所得的比例高居世界之冠，養育子女的高昂成本正可顯示明東亞超低生育率的困境（陳玉華、蔡青龍，2011）。育兒的負擔若再加上壽命延長後的養老需求，長期而言可能惡化家庭的財務平衡。

參、家庭支持功能與家務性別分工

臺灣社會對於近期超低生育率仍束手無策，若參照歐陸、北美等國實施之生育或家庭政策，甚至更廣泛的移民政策，不但顯示臺灣現有政策推動的起始點過晚、資源不足，而且明顯存在區域差異，導致相關政策的整體成效有限，長此以往可能落入低生育率陷阱難以掙脫。從理論和實證經驗來說，生育率下降是導致人口老化的主因。老化速度快、高齡人口變多，家庭形式、功能與代間支持關係都將隨之轉變。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臺灣社會目前的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由於不同出生世代已呈現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程、多樣的支持與互動關係，產官學各界宜提早規劃相關政策以顧及個人與家庭的福祉，藉以滿足個人與家庭對於社會安全保障的多元需求。

近年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趨勢不僅造成家庭結構與規模產生質變與量變，前述探討之生育與婚姻轉型更進一步改變組成家庭的時間與形式。這些存在家庭內部的動態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已陸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作為社會基石的家庭，能否繼續維繫其繁衍後代、經濟支持、社會化、教育、保護照顧、代間支持等功能。對於個人而言，傳統家庭可提供的經濟支持功能已逐漸弱化，由於所得分配不均的擴大，失業與低所得階層家庭的經濟弱勢更加明顯。伴隨著家庭結構與組成縮小化，縱向與橫向的親屬網絡與關係不但變少，也變得疏離(Bengtson, 2001)。此外，新型住宅聚落大量興建後，過去往來密切或奠基於親屬網絡的社區組織，對於其中家庭具有的互助與社會支持功能也在改變中。

生育率下降與人口老化的結果，使得家庭照顧的對象不僅止於兒

童，也包括數量日增的高齡人口。本文利用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附屬之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圖4呈現2008年與2014年之間家庭內部對於日常照顧以及財務支援需求的變化。就日常照顧需求而言，隨著生育率下降與壽命延長，幼年的照顧需求降低，但是老年照顧的需求則逐漸增加，而需要同時照顧幼年與老年家人的三明治世代亦同樣增加(Wiemers & Bianchi, 2015)。在財務支援方面，整體的趨勢與日常照顧需求相似，相對值得注意的部分則在於隨著生育數下降，需要提供子女或孫子女經濟性支持的比例下降的幅度較大(Altonji et al, 2000)。隨著臺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成年子女提供年長父母一般日常照護與經濟性支持的需求勢必增加，加上家庭的代間支持功能逐漸弱化，政府亟需及早、全面地規劃長照與高齡社會的永續性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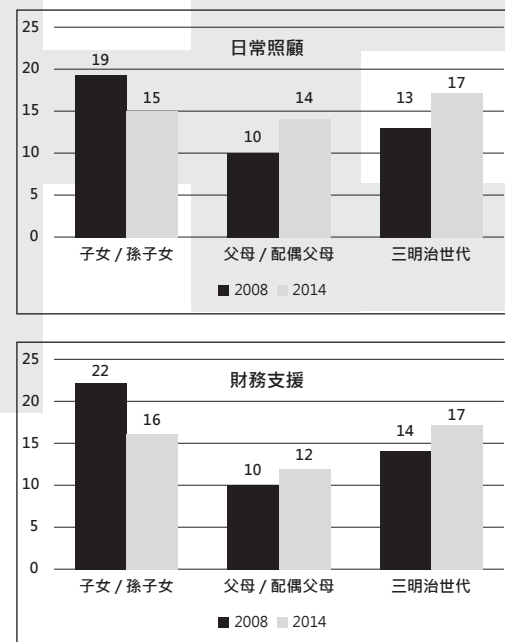


圖 4. 2008 年與 2014 年中高齡民眾家庭支持類型之變化

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除了需思考如何維繫世代之間的家庭支持功能，或是透過政策補足世代支持系統之不足，藉以滿足老年與幼年家人的經濟與照護需求，也需要探討人口與家庭政策爭論的重點，亦即如何改善家庭與工作需求造成的時間與人力安排的困境。根據最新公布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主計總處，2016）結果顯示，對於婚前有工作的女性而言，曾因結婚或懷孕生育而離職的比例分別為18%與13%，擁有大專及以上程度的女性因婚育而離職的比例則稍低於其它教育程度者。婚育事件成為女性就業的限制因素仍然繼續存在臺灣社會，曾因婚育事件退出勞力市場的女性也僅有半數得以在子女入學後再重回職場，不友善的職場限制造成臺灣女性人力未能充分運用，殊為可惜。

除了婚育因素對於女性勞動參與的抑制現況，女性仍然是家務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不論是在家務工作的類型以及時間的投入都明顯比男性家人或配偶多。表2呈現臺灣地區15歲以上女性在家庭中每日投入無酬照顧的時間，包括照顧子女、老人、其他家人、做家事等項目。按年齡分層觀察，15至24歲女性因在學比率較高，無酬照顧時間最短，25至49歲女性主要花費時間在做家事與照顧子女，50至64歲與65歲以上高齡者多已退離勞動市場，做家事時間也較長。另就婚姻狀況觀察，未婚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明顯低於已婚者。對於已婚有偶的女性而言，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為3.81小時，其中以照顧子女花費時間最長，其次為做家事，至於其丈夫（含同居人）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僅1.13小時，其中雖亦以照顧子女、做家事花費時間較長，惟皆遠低於有偶女性之花費時間。另一重要的調查結果顯示，對於育有子女、年齡介於25至39歲之間的有偶婦女而言，平均每日投注於照顧子女、做家事的時間是其配偶的4倍與2倍。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突顯臺灣家庭內部的家務性別分工距離實質的兩性平等仍有改善的空間。針對如何提升男性家庭成員分擔家務工作，受訪婦女除了表達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與價值觀需要被倡議之外，更動職場對於

工作形式與時間安排有利男性可以顧及家庭事務、社會對於分擔家務的男性應該給予讚賞，都是促成兩性分工的正向推力。

表 2. 15 歲以上女性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

	總計	照顧子女	照顧老人	照顧其他家人	做家事
15-24 歲	0.66	5.98	0.97	0.96	0.71
25-49 歲	3.08	3.40	1.48	1.36	1.65
50-64 歲	3.22	1.83	2.41	3.06	2.38
65 歲以上	2.26	3.17	2.56	2.78	2.04
有偶女性	3.81	3.37	1.88	2.62	2.25
丈夫	1.13	1.41	1.48	1.47	0.87

資料來源：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行政院主計總處。（單位：時）

肆、因應高齡社會之人口與家庭政策思維

兩性平權思維的普及與婦女勞動參與的提昇，使得傳統以婦女作為家庭主要照護人力的安排模式已無法滿足實際的照護需求，引入外籍家庭看護人力、國內照護人力的規劃都是當務之急。因為生育子女數下降，成為獨生子女機會增加，加上資訊科技的發達與家庭、就業型態的改變等，子女幼年期由父母親自教養機會下降，教養方式與社會化的形式也會受到影響。國人對於婚姻與家庭的態度出現轉變，除了單身人口增加，跨國婚姻的比率也隨之升高，部分新住民家庭的經濟弱勢與子女教育問題亟需政策介入與支持。而離婚率升高、單親家庭數量增加、家庭暴力事件頻傳、婚姻與親子家庭關係不穩等問題，則需要擬定相關家庭政策予以因應。

雖然現已公布之社會、人口政策大多觸及家庭相關議題，但是卻缺乏以家庭為核心作為規劃主軸的家庭政策。以2013年修訂之「人口政策白皮書」為例，為因應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等社會發展趨勢，已提出短、中、長期政策規劃與措施，但是與家庭直接相關者主要見於兩個部分，在「少子女化社會之對策」部分，強調藉由提升婚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提供育兒家庭之經濟支持措施、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以及強化兒童保護體系等政策規劃以改變少子女化的困境；另一部份則見於「高齡化社會之對策」，預期透過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健康體系藉以滿足高齡人口的照顧需求。目前與家庭有關的政策仍未完全整合，且分由不同的政府部會負責擬定與執行，因此制訂整體家庭政策實為當務之急。

2015年完成的高齡社會白皮書，以建構「健康、幸福、活力、友善」的高齡新圖像做為願景（衛生福利部，2015a）。然而，活到老不難，難在於如何活出幸福感！我國現有之高齡人口政策，從「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人口政策白皮書」直至與高齡社會白皮書同年修訂的《老人福利法》，皆規劃透過政策執行來保障失能高齡者在經濟安全、健康、生活

照顧等需求，尤其是如何預防失智、延緩失能的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以及何時開始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是當前針對長期照顧議題的兩大政策重點。

臺灣家庭內部照顧者的特性，女性明顯多於男性(56.3% vs. 43.7%)，而且多由兒女負起照顧責任(57.2%)，其次才是配偶(32.4%)（衛生福利部，2015b：17）。隨著生育子女數、家庭規模逐年縮減，為能滿足家庭照顧高齡長者的人力需求，2015年通過的《長期照顧服務法》特別加入外籍看護及照顧服務員專業照顧訓練政策，以作為我國長期照顧發展的補充性人力。由於本國籍照顧服務員人力的使用成本比外籍看護為高、服務時數較缺乏彈性，而且服務內容也未能完全符合照顧失能者家庭的需求。相形之下，更突顯外籍看護提供較長時間的照護服務與陪伴，更能滿足有高齡或失能家人家庭之實際需求。2017年9月之勞動統計月報資料即顯示，截至2017年8月底社福外籍勞工在臺總數為24萬6,485人，數量占有所有外籍勞工人數的37%（勞動部，2017：21），顯示許多臺灣家庭仍舊偏好聘僱外籍看護作為照護服務人力。

隨著臺灣民主轉型、公民運動蓬勃發展，愈來愈多民眾質疑經濟優先、偏重資方的政策走向。欲全面規劃高齡友善的社會環境，應當廣邀各方人才「走入體制、打造制度」。歐洲國家與日本福利制度轉型的經驗顯示：沒有一個政黨的政策主張能夠長期、全面解決高齡社會問題。臺灣近期選舉結果則突顯：「重新分配資源，公平對待各個社會階層，凝聚社會公義與共識」的主張普遍獲得選民支持。

透過政治治理改革社會福利制度，雖可獲得充分的民意支持，通常曠日廢時。在公共政策尚未提供老年人口全面的經濟安全保障與福利服務之前，政府應當思考短期內如何提供誘因、藉助家庭與社區支持系統滿足高齡者的立即需求。以新加坡的組屋政策為例，為了強化家庭的代間支持功能，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或是住在附近，都可獲得購屋費用補助、享有優

先分配房屋的權利。以「三代同鄰」取代「三代同堂」的居住安排，既符合現代生活型態與偏好，也可顧及高齡者的照護需求（陳玉華，2016）。



參考文獻

- 戶政司 (2016)。〈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庫〉。取自 http://www.ris.gov.tw/zh_TW/674
- 主計總處 (2016)。《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 105 年》。臺北市：行政院主計總處。
-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105 至 150 年)〉。取自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84223C65B6F94D72
- 陳玉華 (2016)。〈創新高齡服務之國際倡議趨勢〉。《國土與公共治理季刊》，4(1)，頁 33-42。
- 陳玉華、蔡青龍 (2011)。〈東亞國家超低生育率的成因、困境與策略回應〉。《人口學刊》，42，頁 155-163。
- 勞動部 (2017)。〈勞動統計月報〉。取自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5%E5%85%A8%E6%96%87%E7%80%8F%E8%A6%BD.pdf>
- 衛生福利部 (2015a)。〈高齡社會白皮書〉。取自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767>
- 衛生福利部 (2015b)。〈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 (104-107 年)〉。取自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730958/37bc9015-e3da-4ba8-9a98-cd8c5384b97a.pdf>
- Altonji, J. G., Hayashi, F., & Kotlikoff, L. (2000). The effects of income and wealth on time and money transfer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A. Mason & G. Tapinos (Eds.), *Sharing the Wealth* (pp. 306-3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ngtson, V. L. (2001).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ultigenerational bon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1), 1-16.
- Chen, Y. H. (2012). Trends in low fertility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Taiwan.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10(1), 78-88.
- Dalla Zuanna, G., & Micheli, G. A. (2004). *Strong Family and Low Fertility: A Paradox? New Perspectives in Interpreting Contemporary Family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u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authier, A. H. (1996).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oldstein, J. R., Lutz, W., & Testa, M. R. (2003). The emergence of sub-replacement family size ideals in Europ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2(5-6), 479-496.
- Iwasawa, M., & Kaneko, R. (2010, April 28-30). *Explanations for regional fertility reversal after 2005 in Japan: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tem 5 - Constructing assumptions for fertility: data, methods and analysis, Conference of European Statisticians,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stat), Joint Eurostat/UNECE Work Session on Demographic Projections, Lisbon, Portugal.
- Kaneko, R. (2010).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recent fertility upturn in Japan: Application of a fertility projection model to period effect analysis. *Journal of Population Problems*, 66(2), 1-25.

- Klüsener, S., Neels, K., & Kreyenfeld, M. (2013). Family policies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fertility divide: Insights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Belgiu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9(4), 587-610.
- McDonald, P. (2008). Very low fertility: Consequences, causes and policy approaches.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6(1), 19-23.
- Myrskylä, M., Goldstein, J. R., & Cheng, Y. A. (2013). New cohort fertility forecasts for the developed world: Rises, falls, and reversal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9(1), 31-56.
- Wiemers, E. E., & Bianchi, S. M. (2015). Competing demands from aging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in two cohorts of American wom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1), 127-146.

| 撰稿人簡歷資料 |

陳玉華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人口研究組組長、臺灣人口學會常務理事、臺灣農業推廣學會常務理事、《人口學刊》執行編輯、《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Family Research》編輯委員

學歷：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鄉村社會學暨人口學博士

經歷：美國布朗大學 Joukowsky Fellow、德國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訪問學者、臺灣農業推廣學會秘書長

蕭玉資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研究助理

嚴善英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碩士研究生